

疫情風暴中的中國赴美留學生：一場特別“成人禮”

今年3月,紐約大學大一學生、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熊可欣經歷了一場特殊的“成人禮”。

病毒在美國蔓延,學校受疫情影響關閉宿舍,第一次遠渡重洋學習的熊可欣卻決定留下。之後兩天里,她第一次在校外租房,獨自搬到了距離學校15公里以外的地方。到達新住所的第二天,熊可欣正式邁入18歲。

熊可欣形容自己是“時代洪流下的螻蟻”,無力改變社會現狀,但可以盡力做到獨善其身。她在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說,“它(疫情)給了我磨練自己的機會,在混亂的大背景下,一個人去生存、去適應,同時學會控制心態,保持冷靜。”

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約有40萬人,當中國疫情緩和,病毒在美國蔓延的時刻,有人選擇回國暫避風險,在國內日夜顛倒遠程上課;有人中斷學業,認為高昂的學費應該換取更好的課堂交流和文化體驗;還有多人留下繼續學習。疫情依然嚴峻,5月暑期將至,留下的人將面臨更多挑戰。

艱難的選擇

熊可欣農曆初一過後從中國家鄉重慶回到美國,疫情隨後在中國多個城市蔓延。重慶與重災區湖北接壤,加上祖父母家住湖北,她一直密切留意國內狀況。當美國出現零星病例,她雖然預感可能擴散,但覺得做好防護就能渡過難關。

但沒想到的是,3月16日,熊可欣收到學校通知,稱受到疫情影響,將在22日關閉學生宿舍,要求所有學生儘快搬離。當時紐約州報告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有近千人,紐約大學內有三個。幾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更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學校又發了一封郵件稱,學校宿舍可能要應對紐約州醫院過載而改成緊急醫療中心,要求學生次日搬離。這種安排後來遭到很多學生訴病。

“剛開始還是有點慌,畢竟時間太緊了,”熊可欣說。她觀察,大部分國際學生都處於慌亂狀態,一時不知作何打算。許多家長也是托親拜友,熬夜幫孩子尋找回國機票,有些甚至向大使館請願,要求幫忙解決住宿問題。

雖然已經開始遠程上課,但熊可欣這個學期課程緊密,每周幾天都是朝九晚六。有些課還需要通過實時答題,賺取課堂參與分。加上當時中國為了防止境外輸入病例增加,急劇減少了國際客運航班。本來只要十幾小時的旅途現在變成數十小時,並且中轉多個地方,令途中感染

風險增加。

綜合考慮後,熊可欣決定留下。疫情隨後以迅猛的速度在美國擴散,紐約州更成為美國東部疫情的“震中”,確診病例直線上升。

大部分長輩也許認為,在面對學業和健康時,選擇健康是最明智的決定。熊可欣在中國的祖父母也是同樣態度。他們打來電話時會控制不住情緒,哭着勸她:“你要是回來就好了,起碼回來我們能看到你,心里也有個底。”

給家人帶來擔心,是最讓熊可欣覺得難受的事。與此同時,她身邊的中國同學也陸續回國了。但她依然沒有動搖當初留下的決定。在她看來,學業和健康不是零和遊戲,在疫情面前也有辦法保障健康。

她的母親,做教育諮詢服務的聶一會對女兒的決定表示支持,說“自始至終都沒想過讓她回國”。她告訴BBC中文,“在這種全球化傳染病面前,哪里都不是淨土。既然遇到了,那就做好個人防範,在這樣的風險中成長是最重要的。”

母女倆一起在網上找了幾個房源,簡單比較一下,排除了幾個疫情嚴重的地方,便決定了。“這其實是一個鍛煉我廚藝的好機會,”熊可欣自我調侃道。一部電腦、一本Kindle電子書、一個瑜伽墊,就能讓她知足地在家待上一個禮拜。

生活的艱辛與成長

母女倆的心態與其說是樂觀,也可以說是無奈。3月29日,中國民航局開始執行“一司一國一線”政策,即一家航空公司在一個國家內僅保留一條航線,並且每條航線每周運營的班次不能超過一班。這時回中國幾乎成了奢望。而隨着疫情在全球蔓延,旅途中感染風險也越來越高。在目前中國輸入感染人群中,三成以上是留學生。

熊可欣說,包括自己在內來往比較密切的8個同學有7個回了中國。據她觀察,在美國讀大一、大二的中國留學生回國和留下的比例大致為六四開,回去的居多。但大三、大四的中國留學生回國和留下的比例則為四六開,留下的居多。



在吃過室友姐姐準備的簡單生日蛋糕後,熊可欣便安下心來開啓18歲的疫區生活。

她大多數時間在家上網課、讀書、看電影,時不時與回國的小夥伴們“雲上”聊天。大概半個月去一趟樓下的超市。“全副武裝出去,買完東西後瘋狂地趕回來。”

護目鏡、手套、口罩、消毒水、酒精棉,是她的全套裝備。回來後消毒門把手、鞋底、衣服和所有食物。大米、乾貨放進空房間隔離兩天,蔬菜、水果20分鐘後擺進冰箱。身上的衣服扔進洗衣機,自己進入浴室沖涼。

媽媽的微信群

母親聶一會雖然嘴上說,對女兒在疫區中生活屬於“正常範圍的擔心”,但行動上還是時刻關注着大洋彼岸的動態。

她在社交媒體微信上與同樣留守的學生父母建立了家長群,還加入了各種與留學生相關的群組。包括各種重慶地方商會、同鄉會、華人的律師團、醫生團,“還有5個紐約買菜群”,她說起來如數家珍。這些群組在疫情爆發後迅速冒起。

“我覺得我把所有在紐約的華人都挖出來了。紐約一共有1450個四川人重慶人,我都瞭解到了,”聶一會笑着說。她給很多人無償寄了防護物資,一方面希望幫助他人度過難關,另一方面也希望女兒有什麼事可以得到照應。

這種互助精神也讓熊可欣感受到了中國文化中集體主義的力量。而另一方面,母女倆嘗試贈予美國人防疫物資,卻多被謝絕,並告知會自己解決,這讓她看到了西方個人主義下的獨立精神。疫情下的親身經歷,給她上了中西差異的一堂課。

不確定的未來

對於接下來的打算,熊可欣說還在“觀望”。目前正逢美國大學的春季學期,學生大多在上網課,相對壓力較小。但隨之而來的是5月畢業季和6月實習期。疫情令美國經濟進入寒冬,不少企業大規模裁員。到時能否找到工作或順利實習,留在美國能否維持合法身份,如果回國航

班是否暢通,都讓不少留學生面臨新一輪挑戰。

在紐約大學讀媒體藝術的研究生陳雯就陷入了這樣的困境。她告訴BBC中文,當初選擇留下,很大原因是因為今年6月即將畢業,正在申請美國政府提供給留學生的工作許可,即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該許可允許學生畢業後留下12個月,而申請階段要儘量待在美國。如果畢業後60天內沒有拿到OPT,就要離開美國。

“感覺很不真實,我們現在在做畢業論文,本來應該是最忙的時候,正常情况下都會去學校工作到很晚,”陳雯聲音低落她說。她住在紐約布魯克林區,除了倒垃圾,已經快一個月沒有出門了。

她獨自一邊準備畢業論文,一邊找工作。少了集體學習的氛圍和同學間面對面的鼓勵,加上較少運動,陳雯說自己現在比較懶散,“處於一種疲軟狀態”。為避免家人過于擔心,她儘量報喜不報憂,因此希望使用化名。

陳雯在讀的專業就業面較廣,可以考慮的行業包括設計、互聯網、廣告、媒體等等。她說,大部分上一屆畢業生在更短的時間就已經找到了滿意的工作,而這屆到目前為止,二、三十人中只有兩人拿到錄取信。在過去兩個月里,陳雯每周大概給10家公司投遞簡歷,但目前收到回應的只有兩家。

陳雯說“還沒有太絕望”,會再努力試試。她給自己定了一個半年的期限,如果還是進不了心儀的公司,會任意選一個將就一下。“感覺花那么多大力氣出來不容易,如果突然回去有點浪費這段經歷。”

在密蘇里州聖路易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讀生物學的大三學生李梓芃這個時候本來應該在實驗室做實驗,但實驗室因疫情關閉之後,他只能在校外住所遠程上課、做書面研究。

李梓芃告訴BBC中文,他正在申請美國醫學博士學位的人學資格,幸運地在機構關閉前完成了入學考試。但不確定的是,分數能否滿足申請資格。

如果不能滿足,他將和很多被迫取消考試的學生一樣,無限期地等待下一次安排。這樣的話,李梓芃有可能要在明年大四畢業後,延長一年留在美國的時間,以OPT的身份邊工作邊申請學校,壓力會很大。

在新冠病毒發現之前,赴美留學就已經因限制敏感專業、收緊工作簽證等因素而受到影響。疫情衝擊下,中國留學生在追求“美國夢”的路上繼續跌跌撞撞。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的新冠病毒疫情有所緩解,世界其他地方的疫情加重。於是國內的親戚、朋友和同學們就開始聯係我,商量是否應該讓他們在國外留學的孩子回國躲避疫情。

其實這些熟人大都屬於國內的精英層,有的本身就是資深的醫生。他們經常出國,對美、加、西歐等都很熟悉。疫情之前,他們都自然地覺得,西方國家遠比國內先進,包括醫療條件,所以孩子在國外他們很放心。但是最近國內媒體和網絡把西方疫情描述得很可怕,好像武漢發生過的情況在西方國家都發生了,而且比武漢更嚴重,尤其是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新冠確診人數與死亡人數都遠比中國高。於是他們不由自主地疑問,難道美國的疫情比中國更危險、紐約比武漢更糟?本來對歐美很熟悉、很有信心的人也動搖了,不知所措。

我並沒有醫學背景。熟人們找我詢問意見,只是因為信得過我,覺得我在美國生活多年,並且也有孩子在上大學,還是在美國疫情較嚴重的地方,所以認為我應該瞭解美國的疫情。與這些家長交談了幾次之後,我發現他們的問題都類似,而且我的回答也逐漸定型。既然他們覺得我的話對他們有幫助,我就想寫出來,也許能幫助更多的人。在以下文字中,我主要對比中國和美國的情況,其他西方發達國家,比如加拿大、英國、德國等,與美國的情形大同小異。

中美在同一起跑線上

首先,新冠病毒對於全世界都是嶄新的,所以中國與美國大致處在同一起跑線上。到目前為止,兩國都沒有特效藥物或治療方法,也都在研究和實驗一些新藥,比如Remdesivir、氣隆等,但都還沒有成功。無論孩子在哪一國,都可能染上新冠病毒,都可能發展成重症、甚至死亡。所以在疫情期間,孩子無論在哪兒都有風險,都要特別小心。如果不幸真感染了,在目前狀況下只能靠自身免疫力抵擋病毒。不能指望醫藥的力量。醫療體系只是給予輔助性的服務,比如為你測試病毒、給你一張病床、監視你的病情、在狀況加重時為你提供呼吸機等。總之,在技術層面,孩子默在中國或美國得到的醫療服務相差不多,中美都沒有決定性優勢。

兩國不一樣的地方在于,美國的醫療體系相對普惠,老百姓與達官貴人接受的服務差別不大。而在中國,一般人與高干或有關係的人相比,境遇天差地別。老百姓在平時也會看病難、醫院里一床難求,看不到專家、不受醫生重視等。有特權的人得到的服務則與美國比肩。中國的疫情爆發時,多地出現過醫療資源被擠兌,尤其在武漢,使得大量病人得不到醫療照顧,本來有生存希望的人也可能因此喪命。中文媒體和網絡盛傳,美國在疫情初期也有很多駭人聽聞的情況,比如紐約的新冠病人因為得不到床位而躺在醫院的走廊里、醫護人員因為缺乏防護設備而穿着垃圾袋工作、危重病人得不到急需的呼吸機等。但是後

來證明這些傳聞都是假的。即使在疫情最壞的時候,美國也沒有出現病人得不到正常醫療服務的情況。所以,出身於大陸內地老百姓家庭的留學生,如果不幸感染上病毒,在美國可能得到正常的醫療照顧。但是如果孩子來自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家里有地位和關係,回中國抗疫可能更好。因為這些大城市有良好的醫院和醫生,如果父母是高干或與醫院有特殊關係,孩子可能得到很好的醫療服務。

微信中曾傳說紐約市醫院里的情况,病人得不到

留學生應該回國躲避疫情嗎?

床位,躺在醫院走廊的地板上。

紐約殉職護士Kious Kelly。他與同事們在疫情期間穿着垃圾袋工作,曾被全世界各大媒體刊登。他死後,他的親友們曾呼籲全社會捐贈醫用防護設備。在微信上,很多人用他的故事做例子,聲稱美國醫院缺乏基本的防護設備。後來,他所在的醫院官方澄清,這張照片中的三個護士都穿戴着醫院提供的全套防護設備,醫院里也沒有出現過醫護人員沒有防護服可穿的情況。Kelly生前有嚴重的哮喘病,而新冠病毒對哮喘病人的危害極大。他的死疑似與他的哮喘有關。

微信上曾流傳說,紐約和美國很多地方嚴重缺乏呼吸機,危重病人因此面臨不必要的生命危險。在4月15日之後的這幾天里,美國疫情停止增長,社會緊張程度緩解。白宮疫情工作組在每天的記者招待會上總結說,即使在疫情最緊張的時候,美國也沒有出現新冠病人得不到正常醫治的情况,尤其是每一個需要呼吸機的病人都得到了呼吸機。

中美的數據對比

與我聯繫的那些家長朋友們,正是因為看到這樣的數據,才開始懷疑美國的醫療體系,找我商量是否讓孩子趕緊回國。我覺得有兩個主要原因造成了違反常識的中美數據剪刀差,一是兩國的統計方式不同;二是中國出于政治動機故意造假。這兩個原因相互聯繫。中國採用目前的統計方式,背後的關鍵動力正就是政治考慮,而不是醫療要求。

關於統計方式的不同,首先,沒有測試就沒有確診。美國測試了大約400萬人口,遠遠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中國沒有公佈確切的測試總數,但國際上普遍認為,中國的測試數量低於韓國。韓國測試了大約55萬人,中國的測試量應該低於55萬,而且很可能遠低於這個數,因為韓國一直堅持對國民測試,而中國早已停止了大規模測試。被測試的人口多,確診的人數自然就多。美國的總測試數比中國多了很多倍,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美國的確診數遠比中國高。另外,有做醫生的朋友講,國內的很多醫院已經不用測試盒了,轉而主要依靠透視辦法篩選病人。這樣確診的病人都是新冠感染已經發展到嚴重的肺炎階段,自然就排除了絕大多數輕症或無症狀新冠感染者,人為地大幅度降低了確診人數。

其次,關於死亡人數,美國廣義定義新冠死亡。如



果病毒感染對患者的死亡或急救有影響,就被計入新冠死亡。例如,在我居住的賓夕法尼亞州,一位老人在家里摔倒、傷及大腦,在搶救時發現他已經感染病毒。他死後就被算作新冠死亡,因為醫生認為他的感染影響了搶救。而中國狹義定義新冠死亡。病人的感染轉化成新冠肺炎,肺炎再嚴重惡化,造成病人死亡,才算是新冠死亡。其實,在新冠病毒感染者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轉化成肺炎;在新冠肺炎患者里,又只有很小一部分嚴重到喪命。美國的醫生發現,在需要住院治療的新冠重症患者中,

留學生應該回國躲避疫情嗎?

90%的人患有其他嚴重疾病。也就是說,很少有人只因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成為重症患者。德國的研究人員解創了在漢堡的全部44位新冠死亡人,發現他們都死于並發症,沒有一個純粹死于新冠病毒。他們原來都有嚴重疾病,比如心臟病、高血壓、癌症等,並且幾乎都是老年人。即使沒有感染新冠病毒,他們也將不久於人世。因為西方的新冠死亡定義很寬,所以他們都被納入。如果收窄定義,他們中的很多人就可能不算。定義的寬窄強烈地影響官方的新冠死亡人數。

美國對疫情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的定義,符合國際通行標準。中國相對應的兩個定義,更接近新冠肺炎的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而不是新冠病毒感染的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新冠肺炎是新冠病毒感染的極端形式,佔比很低。類似地,美國統計流感疫情,也遵從廣義定義。新冠病毒爆發以來,中國網民們開始

關注美國歷年的流感統計數據。美國官方公佈,每年大約有5萬到10萬美國人死于流感。很多中國人被這個數字嚇住了,根本原因是他們不理解美國的統計方式。美國人並不比中國人更容易死于流感。實際上,我和熟悉的朋友們從中國來到美國,都感到美國的環境遠比中國清潔,大眾接種流感疫苗也遠比中國普遍。我們在美國感染流感的概率比在中國時低很多。那些“死于流感”的美國人,幾乎都死于流感與其他疾病的並發症。一般中國老百姓覺得“流感是小病,不死人”,甚至經常不區分流感與感冒。比如老年人在秋天得了流感,在冬天死于多器官衰竭或敗血症。中國人會覺得他的死因是多器官衰竭或敗血症,想不到歸咎于流感。但是在美國,他會被計入流感死亡。中國人習慣和接受了狹義的“因病死亡”概念。按照這樣的標準,流感在美國也一樣“不殺人”。

關於政治力量影響統計數據,這在中國是常態,人人都知道。但是具體細節是機密,老百姓無從知曉。我能看到的都是公開的部分,最多算是冰山一角。比如在疫情期間,“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負責統籌全國抗疫。其人員組成偏重“維穩”,完全排除了醫生或醫療系統的人員。在“維穩壓倒醫療”的政治大氣候里,武漢政府在疫情高峰時把測試盒的發放權從醫院和醫生手里回收給疾控中心。疾控中心是行政部門,最高原則當然是對上級效忠,而不是救死扶傷。他們控制測試盒發放總量,以及發放給誰。有記者報道,很多病人的新冠感染症狀明顯、病情嚴重、甚至死了,也沒有得到測試盒,所以

從沒有被計入疫情統計。這樣的死亡,也只能算成普通肺炎死亡,不被計入新冠死亡。再者,疾控中心為了壓低新冠死亡率,選擇性地把測試盒發給疑似感染,但病症輕微的人,造成一段時間里雖然每天的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都大幅上昇,但是病死率永遠保持在2.1%的統計奇觀。疫情高峰過後,中央鼓勵全社會復工,於是各地的政府內部文件流出,顯示各級政府直接壓制、威脅醫療部門,不許後者上報或公開新的疫情。

小結

武漢和紐約的疫情有很高的可比性。兩者都是大城市,前者的人口密度比後者還高。武漢在去年12月初出現新冠死亡,到1月23日才封城,病毒有近兩個月的時間自由傳播。紐約在3月14日出現第一例新冠死亡,3月20日就全城開始居家抗疫,中間只相隔一個星期。另外,武漢出現了醫療體系被大規模擠兌的情况,很多病人得不到正常醫治,這是最容易造成大規模死亡的情况。而紐約的醫療體系基本容納了所有正常的醫患需求。按理,武漢的疫情應該遠比紐約嚴重,但是公佈的數據正好相反,並且差距巨大。很容易看出來,武漢的疫情統計被嚴重扭曲。但是很多人還信以為真,並為武漢的抗疫成果驕傲。這種情况很像大躍進時期的“畝產萬斤”,旁觀者很容易看進荒唐,但是當時的全國人民都信以為真,引以為傲。幾乎所有位居高位、有頭有臉的人都加入吹捧,唯恐落後於人。比如錢學森還一本正經地發表了“科學論證”。中國社會就是這樣,大眾總是爭先恐後地順着權力信假相、說假話,卻極少有人敢於逆違權力探求真實、說真話。總體講,中國人尊重權力遠勝于尊重天理。

由於中美社會的不同特點,平民出身的留學生更應該留在美國,享受美國醫療體系的普惠;而特權家庭的孩子更應該回中國,既可以獲得優質的醫療服務,又可以與父母團圓。但是這幾個月以來我看到的正好相反。那些父母位居高位、經常出國,並且家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留學生,相對更願意留在美國應對疫情。大概因為這類家庭看得清世界大同,所以更信任美國。反而是那些來自內地中小城市、父母是小業主、基層公務員、或普通業務、技術幹部,家里沒有特權或關係的孩子,經常以為疫情中的美國很可怕、中國更安全,着急要回家。也許在這樣的家庭里,思想更容易受國內宣傳的影響,讓他們看不懂中美兩個社會的深層區別。總體講,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回國躲避疫情的並不多。而且有趣的是,有些父母平時在網上高調愛國反美,在疫情期間卻毫不猶豫地讓自己的孩子留在西方、不要回國。

最後,我希望把這篇小文送給所有留學生家庭,願大家都平安度過疫情!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于美國家中